

论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辩证逻辑

宋 进

〔摘 要〕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
的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体现了历史视野下的哲学三个元问
题:从哪里来?我是谁?到哪里去?也体现了现代历史意识,在“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
“伟大历史时间”;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实质上也是坚定制度自信 and 不断改革的统一,蕴
含了“变和稳”“守正和创新”等,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稳中求进、进中向好、更好;问题导
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是自觉的问题意识和目标意识的统一,是积极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的统一,目
标导向具有引领问题的方向达到目标引领。

〔关键词〕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辩证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说明讲话中,用“三个
统一”来高度概括《决定》,即“体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问
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①。认识和理解这“三个统一”,是我们进入《决定》逻辑大厦的重要路径,
也是进一步认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重要视域。

一、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
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
统一体现了历史感。一般而言,历史视野下的哲学三个元问题:从哪里来?现在何处(主要回答“我是
谁”)?到哪里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外方代表时对历史感的强调: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③
这三个元问题的延展,还包括为什么去、靠什么去等问题。我是谁(现在何处)?我从哪里来?是实

宋进,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本文系 2018 年度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和价值意蕴研究”(ZX2018-ZD06)研究成果。

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53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70—471 页。

③杜尚泽:《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治国理政新实践)》,《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5 日。

然,是过去、现在;我到哪里去?是由实然出发到理想的应然,是未来。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关系就是理想与现实、未来与现实的关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①

《决定》内在地蕴含两个维度:应然性的维度和实然性的维度,即理想性的维度和现实性的维度。一方面,理想性的“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新境界,其展开方式主要是一种“完善和发展什么”状态,侧重面向未来,即便到2049年,“中国之治”仍会保持其理想性质,从新的实然、新的现实出发走向新的应然、新的理想;另一方面,现实性的“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主要是指目前、当下的,其存在方式主要是“坚持和巩固什么”状态,侧重总结历史。《决定》“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②,体现了应然与实然的观照,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

《决定》从“建立和完善”“形成和发展”“加强和完善”和十八大以来“更加完善”“明显提高”等方面,系统总结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在此基础上,《决定》提出了未来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的前进方向和工作要求。《决定》根据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③和十八大以来的实践,提出了未来“总体目标”和2021年、2035年和2049年三个时间表,以及面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决定》“总结历史”,是“系统总结”与“深入总结”的统一,体现全面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一是“系统总结”,体现全面性。即“系统总结我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制度演变、制度创新”^④,这一历史过程包括十八大以来的改革进程,从时间上包括1921年党的成立至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经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等等,进行局部执政等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又历经制定《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等,建立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及其实践;1956年通过“三大改造”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因此,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我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制度演变、制度创新”,体现了历史连续性、因果制约性、内在关联性和发展创新性的辩证法。

二是“深入总结”,体现重点性。即在系统总结基础上,由远及近,立足现实和面向未来,“特别是深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⑤。这从历史逻辑而言是指向“现在何处”,主要呈现三方面逻辑展开: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⑥;二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336项重大改革举措,进而聚焦从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四中全会,经过5年多的努力,“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⑦;三是问题导向,“还有许多

①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52—5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51页。

⑤《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51—52页。

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2页。

⑦《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48页。

硬骨头要啃”，而“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新的内涵和特点之重要的一点。^①

三是“系统总结”和“深入总结”的根据，主要是三个要素：时代、实践和认识。时代、实践是客观的，还需要基于客观变化的主观认识的发展，体现主客观的一致性。正如习近平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之制”坚持、完善和向“中国之治”新境界的推进，同样是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深入”^③。

坚持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怎样延续历史、如何立足现在、面向什么样的未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老师，“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④。“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根基。历史从哪里开始，文化就从哪里启动。制度、治理既有外在、外显的行为规范，还有内在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制度和治理体系背后有文化、价值和精神。不同的历史文化根基、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会形成不同的制度和治理形态。《决定》总结历史，首次系统阐述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方面的显著优势。

这十三方面的显著优势，既有集中体现制度文化、精神和价值的第七条：“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也有分别论述体现制度文化、精神和价值，例如党的集中领导、人民至上、集中力量办大事、法治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归根到底，如《决定》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及其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一是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原有结构，提升了中国文化，正如1938年张闻天就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输入中国，把中国的思想与文化的发展史，大大地缩短了，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思想与文化的水平”^⑤；二是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传统文化、辨别精华和糟粕、处理传承与转化、创新的科学方法；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其本身及其中国化的成果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体现为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践行了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实践“深相结合起来”，而且要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⑥。中国文化内蕴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如习近平指出的：“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⑦。中国精神、精神品格，既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滋养，也与中国共产党从红船精神开启的精神谱系一脉相承，并呈现出与实践同步的新精神，例如抗疫精神。中国精神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养料。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提供了精神指引。

“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也体现了现代历史意识。“历史时间”这一概念主要是从时间维度来分析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旨在以未来为导向、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习近平在2020年初提到的“历史时间”，并上升至“伟大时间历史”和“伟大历史时间”：“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49页。

②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46页。

④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

⑤洛浦：《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特辑：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解放》1938年第43—44期。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⑦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2日。

不畏风浪、直面挑战,以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继续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目标进发,继续向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进发,继续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① 时间历史和历史时间,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奋进者”“奋进姿态”朝着“光辉目标”和“美好前景”进发,才能构成“伟大时间历史”和“伟大历史时间”。由“伟大时间历史”的“继续”,推进到“伟大历史时间”的“创造”。逻辑在历史中展开,“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的创造,也是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四个伟大”的历史时间。“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②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特别强调:“历史的启示”^③,反对“轻视历史,轻视人类的发展”。历史的内容是过去,但目标是指向未来。李大钊也曾说:“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④时间是万物的尺度,中国特色治理对时间进行规划具有大历史视野,具有面向未来的特质,以稳定的时间节奏使社会向前发展。从“一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两步走”“三步走”到“两个一百年”到十九大规划的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一直保持着发展的计划性、连续性、长远性。特别是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既描绘出清晰的未来蓝图,又为实现目标划定时间坐标,两张时间表高度统一、同步,这说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一步凝聚“中国之制”“中国之治”的强大力量。同时,也可以说《决定》书写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未来简史”,体现实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间逻辑”。时间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一切,时间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习近平所说的“伟大历史时间”。

二、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统一

提出“历史时间”的德国历史学家哈特·科塞勒克还提出了“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保持定力与总结历史相连,主要对应“经验空间”,也包含不能满足、不能止步于历史经验;改革创新侧重面向未来,主要对应“期待视域”,也包含不能只顾未来发展而忽视历史传承性。“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的统一,以未来为导向、坐标,并为之奋斗、奋进,历史时间才体现既定的方向感和使命感。由此,在“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基础上,“保持定力和改革的统一”出场。

习近平早在2007年就提出了“形成内在的‘定力’”^⑤。所谓定力,是与自信相连的,是指面对矛盾、问题、困性、干扰、挑战和风险等时保持自信的心理状态,既保持“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战略定力,又有“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进取精神。《决定》在实践基础上,首次总结、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是我国制度自信的具体化。保持定力和改革的统一,实质上也是坚定制度自信 and 不断改革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的统一,坚持了变与稳的辩证法,有所变有所不变。改革创新是变,变是为了好或更好,是完善、推进,是为了更好的坚持,正如习近平

①习近平:《在二〇二〇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月24日。

②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④《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5页。

⑤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2页。

强调的：“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①变是在保持定力的前提下，不变中有变，就是在坚持的基础上完善，稳中求进、进中向好、更好。其一，变和稳，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邓小平曾指出“最大的不变”与“大变”：“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大变，农村政策就是大变”，“城市改革也是变，是翻天覆地的变化。”^②“大变”是要有勇气更要有基础，这基础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二是制定港澳政策的制度创新和城市改革的治理创新。其二，好和坏，变有变好或更好与变坏两种趋向、可能和结果，要避免坏的结果，变中求进、求好，正如邓小平所认为的：“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③。同时，改革创新的对象也并不是简单的不好，正如习近平强调：“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④。其三，守正和创新，守制度、治理之正，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改革创新体现了积极、主动求变、应变。把坚定制度自信 and 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目标指向固根基、扬优势，根深才能枝繁叶茂并展现出更为旺盛的生命力，优势才能坚定自信并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又是补短板、强弱项，使“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更好、更能、更行。

一方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在守正即坚守社会主义底线的前提下的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变的。守正是守正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方向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和动摇，决不能在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⑤。“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完善和改进，都是在既定方向上的继续前进，而不是改变方向，更不是丢掉我们党、国家、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⑥同时，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一道被称为“四个选择”，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知向何处则方向不惑，明所从来则动力充足。4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就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正如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这里的“又”字，反映了这一历史中心问题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经常性显现。如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中的“又”字。对此，哲学家冯契先生认为：《新民主主义论》“这本著作对一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了一个历史的总结”^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40多年前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尔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4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道里流淌着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就能理解《决定》总结和概括的13个方面显著优势中，排在首位的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这里“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中的“始终”体现了方向性的前进定力。

①《习近平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强调 巩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果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9年7月6日。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3页。

④《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⑤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1期。

⑥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2日。

⑦冯契：《冯契文集》（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另一方面,完善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但它并不是完美无缺、成熟定型的,特别是中国毕竟还正处于并将相当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它不是静态僵化、一成不变、故步自封的教条,而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不断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实践过程、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①。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劳永逸,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需要随着时代、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需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完善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需要继续激扬稳中求变、变中求新、变中求进的改革创新精神。“实现梦想、应对挑战、创造未来,动力从哪里来?只能从发展中来、从改革中来、从创新中来。”^②而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改革创新,需要正确处理中与外的关系。一方面,既要体现植根中国大地的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要研究和借鉴国外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体现制度自信和自觉。正如邓小平曾说过:“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③另一方面,不能本末倒置、照抄照搬。习近平在谈到国家政治制度时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④习近平这里指出的这两种错误观点究其因,是无视自己的制度优势,缺乏定力和自信。定力是由优势而来,优势是比较的结果,形成比较优势、制度自信。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还体现为:一是中与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双重奇迹,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奇迹;二是分与合,之所以创造这样的奇迹,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最大的优势;三是现象与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本质优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⑤例如,从宏观而言,《决定》的主体内容是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为统领在13个方面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重点部署。这13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统一的体系性任务,着眼于制度的整体联动、治理的总体效果,形成制度合力。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13个方面“坚持和完善”,在当下实际的定位、提法上还是有不同的:有些是“制度体系”,有些是“制度”,有的是“体系”,有的是“体制”,有的是“政策”。这13个方面的任务,既是问题也是目标。

三、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和声音,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页。

②习近平:《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人民日报》2014年6月4日。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7页。

④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97页。

识论、辩证法和方法论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似路,提出、分析、研究问题不是目的,坚持问题导向,体现了以寻求确定性为指向,即目标导向,即通过解决问题而达到目标。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体现了制度的价值目标,价值目标是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逻辑起点和逻辑归宿。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性价值和立场问题。中国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展开制度建构。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对人的关注上升到人类解放并置于根本价值,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其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及其体现的价值目标就是要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人类如何获得解放等基本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①毛泽东思想成熟于系统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行进至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迎来了一个“划时代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运而生并与时俱进,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主题揭示了不同问题,将一个又一个问号拉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和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决定》作为“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围绕“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决定》的“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以贯之的“什么是、怎样建”。“坚持和巩固什么”与“完善和发展什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而共为一体,指向“做什么”和“怎样做”不可分离的现实过程,体现历史的、实践的思维方式。“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如同习近平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把“遵守和执行”与“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并列:“要抓好3件事,一是坚持和巩固,二是完善和发展,三是遵守和执行”^②。“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既体现了保持定力、必须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基本原则,又阐明和部署了在此前提下不断改革创新、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因而,“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包涵了辩证逻辑,既有什么是与怎样建、做什么与怎样做,也呈现什么是正确的事、怎样正确地做正确的事,体现了知与行、建章立制和落地生效等的辩证关系。

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问题导向是问题意识的表现。习近平经常将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问题和矛盾相连,“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问题”^③。具有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具有鲜明的逻辑结构和内容,用习近平的话来概括,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④。

“问题”的厘定。在哲学语境中,问题就是矛盾,它表征着影响或困扰人们实践指向的意识状况。毛泽东明确提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⑤这是问题的根据,问题在本质上是指主客体矛盾的体现以及客体本身(时代或社会)矛盾的反映。矛盾的普遍性也就是问题的普遍性。习近平一是进一步指出两者的关联性,“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二是把问题导向与矛盾的普遍性

①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8页。

②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74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15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9页。

相联系,指出“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①。

第二,“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②。一是问题的提出(发现)。马克思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③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习近平强调“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科学提出在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遵守和执行制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二是研究(分析)问题。问题导向需要思考问题,思考问题是聚焦问题、多想问题的主动精神状态,“要开动脑筋,深入思考”,“坚持问题导向,积极主动作为”。^④思考问题是态度,还要有善于分析问题的方法。从现象、局部出发,研究、分析局部后面的全部、隐藏在现象之中的本质,去探寻规律。对此,习近平指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⑤三是解决问题。问题似路,提出、研究问题不是目的,坚持问题导向,体现了以寻求确定性为指向和目的,即为了解决问题。以解决突出问题为切入口,“抓住主要矛盾,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问题”^⑥。解决问题要精准施策,突出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例如:“解决‘四风’问题,要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不能‘走神’,不能‘散光’”^⑦;“要瞄着问题去、对着问题改,精确制导、精准发力,直到问题彻底解决为止”^⑧;“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⑨;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由“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⑩等。

问题导向中的“导向”是一个动态的、向着目标前行的过程,因而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是贯通的。“导向”中的“导”具有主观性,是导向主体引导事物向着希望的方向、目标发展。从认识论视域而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是问题意识和目标意识相统一,而且是自觉的问题意识和自觉的目标意识的统一。目标是奋斗方向,目标导向具有引领问题的方向,是谓“目标引领”。例如在着力点问题上,习近平在讲到党的建设时:“既要以目标为着眼点,在统筹谋划、顶层设计上下功夫,以增强方向感、计划性;又要以问题为着力点,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续用力,以增强精准性、实效性”^⑪。同时,问题导向侧重解决现实问题,目标导向侧重实现美好理想,因而《决定》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既坚持立足实际又坚持为了实现美好理想的目标导向。

《决定》中规划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就是阶段性目标与总体目标的统一。第一个阶段性目标是从十九届四中会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用近两年时间在“十八大以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的基础上,到“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目标;再经过14年努力,“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这一总体目标,一是体现目标的接续、接力,前一目标的实现是后一目标的新起点、出发点,是当前与长远、远与近的统一;二是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阶段性目标和总体目标、分与合的统一;三是《决定》把总体目标具体化,即把总体目标具体化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

①《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6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④《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25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25—26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375页。

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374页。

⑧习近平:《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日。

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142页。

⑩《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1页。

⑪习近平:《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日。

体系等13个“坚持和完善”，是一与多的统一。各领域、各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建设，置于整个国家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体现体系性目标，注重总体性、系统性、具体性和协同性的统一，“突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体现了强烈的问题导向和鲜明的实践特色”^①。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也是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的统一。自觉的问题意识，往往伴随着积极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特质和精神气质，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②。这也能进一步理解习近平为什么强调“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③，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心存忧患、肩负使命，走向目标。而走向目标之路是曲折艰辛的，用李大钊的话说“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④。这也有助于认识习近平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总之，《决定》体现的“三个统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思维。作为思维方式，总体性又是一种辩证思维。“三个统一”正确对待全面与片面、动态与静态、主动与被动、道与器、正与反、内与外、古与今、前与后、远与近、中与外、知与行等关系，合理论、实践、历史、逻辑、规律、目的和价值于一体。

（责任编辑：蒋永华）

On the Dialectical Logic in the Decision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ONG Jin

Abstract: The decision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embodies the unity of summing up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facing the future; the unity of sticking to our basic principles and implement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the unity of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goal orientation. The first unity reflects the three meta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i. e. Where did we come from? Who are we? Where should we go? It also embodies the 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creating the “great historical tim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great history of time”. The second one is essentially the unity of the firm confidence in our system and continuous reform and innovation, which contains “change and stability”; “adhering to what is right and making innovation”;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changes; scientific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active embrace of changes; progress in stability; and progress towards the good and the better. The third is the unity of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goal orientation, and the unity of crisis consciousness and mission consciousness. Goal orientation can ensure our work shifts from being led by the problem to being led by the goal.

Keywords: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decision; dialectical logic

About the author: SONG Jing, PhD in Law,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

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52页。

②《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情况为主题进行对照检查》，《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7日。

③《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④《李大钊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